

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传播的历史叙述

顾文艳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几个特殊篇章的叙述,勾勒出新文学自发生起在德语世界传播和接受情况的社会历史构架。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中德知识界的相互交流密不可分。在汉学家的引介下,极少数新文学初期的现代作家在德语区得到了几近同时的传播,而他们作品的接受范围也集中在汉学学术圈。二战时期,主导现代文学在德语区流传的是同处于政治灾难里的中德知识分子,他们将新文学的德语读者群逐渐扩大至汉学圈以外的知识界。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被政治化的现代文学创作经由不同路径被译介到东西德两个分离的区域;一直到冷战结束后,中德文学交流处处标有意识形态印记,在反映社会政治变化之余,也体现了德语世界知识分子的政治表达。

关键词: 现代文学在德国; 文学交流; 知识分子; 德国汉学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socio-historical framework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Germanophone world by focusing on several representative episodes in the narrative foreground of modern Sino-German literary exchange.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Sino-German literary exchange has been inseparable from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German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ile works from very few distinguished authors gained almost simultaneous German translation and spread thanks to the conscientious sinologists as literary agents throughout the two World Wars, the reception of these works have rarely exceeded academic readership. The interwar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rman-speaking regions was led by intellectuals from both worlds seeking for a common ground to counter the disastrous political reality across East and West, whereas the post-War readership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rmany gradually expanded beyond the Sinology circle. The literary exchange afterwards adopted an increasingly ideological form, along with the geopolitical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the further politiciz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n China, while reflecting the political expression of the Sino-German intelligentsia.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rmany;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tellectual history; German sinology

作者简介: 顾文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晨晖学者。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电子邮箱:wygu16@fudan.edu.cn。

一、知识界的守望：从联邦德国时期的一本鲁迅文集说起

1972年11月28岁的西德作家布赫(Hans Christoph Buch, 1944-)为他编译成德语的鲁迅作品集《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文学与革命文选》(*Der Einsturz der Lei-feng-Pagoda: 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写下后记，将鲁迅同当时西欧左翼思潮席卷下最受敬重的社会型知识分子作家相比较。鲁迅身上“朴实无华的辩证精神”同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相似，而他那“犀利的反讽，自发的唯物主义观”和他“对抗深延至中国20世纪社会的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又恰类似于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长于讽刺争论与文艺理论的德国作家莱辛与撰写百科全书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Buch 1973: 196)。可以说，集“杂文家、小说家、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宣传者”和翻译家于一身的鲁迅，符合当时这位西欧知识青年心目中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部标准；同时，鲁迅作为文学革命家和五四运动先驱，在西欧学生运动时期前后，也是被当时西方左翼青年高调认可的，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文学和政治实践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的。^①因此，对于布赫这样属于德国“六八一代”的青年来说，鲁迅身上不仅闪烁着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光芒，还绽放着“欧洲思想史上无处比拟”的特殊华彩，或许也能够为逐渐陷入困境的西德知识界照亮一个现实的出口。^②

不难看出，布赫对鲁迅的高度评价背后伏藏着西德知识界在学生运动后期的政治诉求。倡导政治实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1960年代的西德一度盛行，到了1970年代随左翼社会力量的不断极端化而逐渐式微。此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失了本土理论和范式，亟需外来力量推动新的反思。布赫特别指出了鲁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与封建传统的糟粕同样不遗余力地批判，“他不仅抨击封建孔教，指控其将文盲大众束缚于迷信愚昧的牢笼，也批判依循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出其体制性的虚妄”(196)。鲁迅在二三十年代认识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中

① 布赫的译著于1973年在他当时任职的一家出版社发行，封面除了标题、副标题、鲁迅的一幅字、一幅肖像以外，只有一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呼吁以鲁迅为榜样的引言“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德语译文“alle Mitglieder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alle Revolutionäre, alle Schaffenden der revolutionären Literatur und Kunst müssen sich Lu Hsün zum Vorbild nehmen, müssen zum ‚Büffel‘ für das Proletariat und die Volksmassen werden, ihnen alle ihre Kräfte, ihr ganzes Leben bis zum letzten Atemzug hingeben.”)

② 本文所引译文，除特殊备注外，皆为笔者所译。

的虚妄,是布赫等西德青年在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而他们眼前更大的虚妄却来自对前一种虚妄的反抗,即对左翼社会主义激进运动的瓦解。同鲁迅一样,布赫一代西德知识分子在冷战中期面对的是绝望与虚妄的辩证,是对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双重批判之间的无地彷徨。或许正是因为身在异域知识界看到了这种相通性,不懂中文的年轻哲学博士生布赫,在1973年坚持出版了这本后来成为联邦德国境内最具影响力的鲁迅德译选集,也是当时西德区除了1955年汉学家卡尔莫(Joseph Kalmer)翻译的选集《漫长的旅程》(*Die Reise ist Lang*)外唯一一本德译鲁迅文集。他从杨宪益的四卷本鲁迅英文译作中编选文章,同时参考意大利语和俄语版本翻译成德语,再请人对照中文逐句审阅。后记的最后,布赫一面承认这本书无法达到翻译和汉学的学术水准,一面却引用鲁迅反驳梁实秋等人对“硬译”的批评——鲁迅用日语转译俄语和德语著作的例子,对当时未能自觉承担起译书任务的德语汉学家们不无指责(212)。相似的境地带来了跨语种文化知识阶层的认同,也留下了中德现代文学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在这一篇章中,德语界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目光跟随着知识界面朝远东的守望。事实上,不止是1970年代,从20世纪初至今,新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一直围绕着德语知识界与中方文人建立对话场域的愿景。虽然这里说的德语“知识界”包括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个德语汉学界,但主导这场文学交流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汉学家。正如不懂汉语的布赫在书中讽刺“继续装作文化大革命从未发生过”(213)的西德汉学家时所指出的,至少在1970年代初期,尽管德国汉学往当代“中国学”方向不断拓展跨学科研究广度,在文学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崇奉古典、边缘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现象。这个情况主要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德国汉学学科不成熟而又近乎共时的发展相关。20世纪最初30年,德语汉学初步从19世纪以耶稣传教会和政治外交为主动力的“前汉学”(Protosinologie)过渡到了游走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研究的汉学学术共同体(王维江8-10)。在此之前,汉学在德语区与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的职业应用密不可分。1897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占领胶州湾,在“从时尚到文学”的各方面实施文化霸权政策。在向中国输出德国政治宗教文化的同时,政府也重视汉学、方志学、植物学等对迅速发展这块殖民地直接有利的学科,大力培养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术人才(Mühlhahn 284)。这个时期到访中国的汉学家,很多在回德之后都成为了20世纪德国各汉学研究中心的奠基人。比如后来翻译了大量中国哲学经典的著名汉学家卫礼贤,就是于189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青岛殖民地的。1909年,曾经同样作为外交翻译官来到中国的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在汉堡获得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

汉学教职席位 标志着汉学在德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五四新文学刚刚起步,而德国汉学界在争取学术独立和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同样处于肇始阶段,他们重视的是传统的古典学研究,自然不会将同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创作初探列入研究正统。于是,一直到魏玛共和国(1919-1933)结束,都很少有新文学作家作品受到汉学家的关注,更不用说被译介成书了。根据1997年梅茨勒(Metzler)出版社发行由沃尔夫冈·吕斯希(Wolfgang Rössig)主编的《世界文学德译著作目录》记载,第一本被翻译成德语并作为单行本发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海上说梦人所撰的小说《歇浦潮》,于1931年出版;第一部五四新文学著作的德译本是茅盾的《子夜》,于中文出版后的第6年——1938年,由德累斯顿的一家出版社发行。^①

在此之前,德语地区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了解极为有限。鲁迅几篇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德语译文,但他的第一本德语版成书著作发行却是二战之后的事了。相较而言,胡适在该时期德语知识界的名声和影响力要远远超过鲁迅。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胡适对古代哲学文化的整理和实证研究在西学界传播较广,二是他本人积极参与了较多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如上一段所述,德国汉学发展前期延续汉学传统,重古代文化研究,包括哲学历史的梳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20年代德国汉学圈广为流传,多次得到德国研究者的借鉴引用。同时,胡适也曾赴德参加学术活动,包括1926年在法兰克福以《中国的小说》为题做的演说。1932年,胡适当选为柏林普鲁士学院通讯院士,获得了中德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席位。与之而来的便是德语区对胡适学者之外另一个文人社会身份的关注: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实际上,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在1920年代初的德语学界就已得到过介绍和认可,^②但他作为文学革命推动者和现代文学作家被德语界接受,应是在成为中德通讯院士之后。1935年,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叙述《文学革命的开始》,由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 1911-1997)翻译,发表在《东亚舆论》(*Ostasiatische Rundschau*)上,向纳粹极权统治日渐扩张的德语世界介绍了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化变革。值得一提的是,霍福民同年在《东亚舆论》上发表的翻译作品还有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在德语世界动荡变革的时期,新文学在汉学圈引起注目,经过零星的译介散播到惶恐

① 参见第7203条, Wolfgang Rössig, *Literaturen der Welt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Eine Chronologische Bibliographie*. Verlag J.B. Metzler, Stuttgart, Weimar, 1997。

② 汉学家叶乃度曾在1920年代编的《中国文学》中两处提及胡适,具体参看范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学对胡适的接受”,《文艺理论研究》3(2006): 93-107。

不安的知识界——尽管这时期的传播者主要还是少数几位稍将目光转向现代的汉学学者,传播范围也止于以汉学界为核心向外扩张范围极有限的德语文化圈。

二、微光中的相遇: 二战前后的现代文学交流

如果我们参考梅茨勒出版社的目录,将1938年德译本的《子夜》(*Schanghai im Zwielficht*,直译为“暮光中的上海”)当作被译介到德语区的第一本五四新文学著作,那么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对中德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就相当重要了。位于这场文学传播中心的是译者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 1884-1961)博士,同时也是1931年第一本德语版中国现代小说《歇浦潮》(*Fräulein Chang*)的译者。库恩的履历同之前列举的几位同时期汉学家有些相似:他在柏林大学拿到法律博士学位后,于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与其他汉学家不同,库恩在1912年返德后虽然回到了柏林大学汉学系,却没有争取教授职位,而是另辟蹊径,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翻译上。很快,他就同当时几个有兴趣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德国出版社合作,将《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古代文学经典介绍给德语读者,畅销于二三十年代的德语图书市场。^①与其说库恩是汉学界的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潜心从事翻译的民间知识分子。《子夜》和《歇浦潮》是他众多译作中仅有的现代小说,都以上海为故事背景。应当注意的是,库恩翻译《子夜》的时间是在二战前夜,而他从1912年起到二战爆发就没有再去过中国。也就是说,库恩从得知到决定译介《子夜》期间,都是在德国通过报刊媒体、外交通讯或个人渠道获取关于中国新文学动态的讯息。关于德译本成形是否通过了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西方人士,曾经有过一些猜测。^②但事实上,库恩在译本开篇简短的序言中就已明确说明,引起他对《子夜》关注的并非驻华侨民,而是当时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馆长胡天石(库恩124)。胡天石是1920年代初期赴德的留学生,就在库恩任教授助手的柏林大学,很可能是在留学期间同库恩结识。1934年,胡天石在瑞士创办中国国际图书馆,库恩专程前往拜访。据胡天

① 关于库恩译生平的汉语文献,有汉学家马汉茂在库恩诞辰100周年时向中国读者介绍所作短文:马汉茂、叶永烈(记,“《红楼梦》的德译者库恩”,《读书》10(1984):101-105。

② 有人曾推测中间的媒介是著名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当时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中国特派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时同茅盾交情甚好,曾于1935年找人将《子夜》翻译成英文,并让茅盾写英译版序言。参见周正章“鲁迅、胡风 and 茅盾的一段交往:关于英译本《子夜》的介绍”,《鲁迅研究月刊》1(1984):“这位博士(库恩)是否和史沫特莱有联系?估计可能性很大。”(5)。

石回忆,库恩因翻译了《金瓶梅》等古典小说在德国译学界小有名气,却被当时的旅德华侨认为是翻译了“极其露骨的淫书,[……]使西方各国人士对我国文学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胡天石 5)而嗤之以鼻,来向胡天石诉苦。胡天石劝他翻译能够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现象和黑暗势力”(胡天石 6)的新文学,比如茅盾的《子夜》,并立即找出书借给他。尽管胡天石这篇为纪念茅盾逝世而写于 1981 年的回忆叙述口吻相当官方,甚至多处与史实记录不符,^①但他向库恩推介并促成出版《子夜》——德语界翻译的第一本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这个事实无可厚非。库恩翻译《子夜》前后,胡天石已在欧洲文化外交界十余载,作为国际劳工大会“中国顾问”和驻瑞士中国代表加入了茅盾等人建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支持国内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在这个非常时期,向国际社会推介一部描绘大革命后期中国社会现象的作品,既符合胡天石作为国际图书馆馆长的职责,也是一名爱国知识人在海外的责任担当。

这样看来,这一时期围绕《子夜》的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就是从库恩和胡天石两位正在共同经历黑暗历史年代、也共同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交往开始的。不过,胡天石只是让库恩了解到茅盾的创作,促使这位已游移出学院汉学、走向民间的翻译家动笔的原因,是在于《子夜》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在今天的中国,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过程是进展到了何种程度”(库恩 125)。显然,库恩这句话是站在东西文化之间传播者——或者也是“融合者”的立场说的。通过自身参与中德文学传播实践,他密切注视着现代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包括 19 世纪以来随现代化技术发展和全球性战争促逼而成的“融合”。从这一点出发,《子夜》以一战后欧洲经济恐慌影响下的中国民族工业危机为时代背景,的确呈现了 20 世纪初期中西政治文化的影响与交汇,以及融合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激烈的冲突、民族的困境甚至人性的危机。除此之外,在序言的末尾,库恩还提醒读者把《子夜》中描写的年代同 4 年后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联系在一起,称书中的事态也许“有助于这个重要革新运动的建立”(125)。库恩这个政治上多少倾向国民政府的理解,包括他译作中的一些转义后来受到了中国研究者的驳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库恩邀请德语读者将《子夜》当作“新生活运动”之前的“子夜”来阅读,延续的正是促使他翻译这本书的逻辑。他在茅盾的书写中看到了中国现代社会文化里不可避免的东西方“融合”,并以此看到了中国社会对一场结合东西方思想文化革新——比如混合了东方儒家和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新生活运

① 在胡天石的叙述中,库恩解释他此前选择翻译《金瓶梅》等作品的“错误”时“推托”说自己从未到过中国,显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动”——的迫切需求。无论此理解正确与否,对于处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的库恩来说,如何通过改革来规避,或者至少是减轻东西方在现代危机中相遇后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灾难,是非常值得关心的话题。

然而,冲突和灾难已无法避免。库恩为他的《子夜》译作写序言的日期是1938年5月。两个月以前,希特勒率先在人群的欢呼中来到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宣告德国和奥地利在纳粹党统治下合并,正式开始了对整个德语区的犹太人,以及所有持不同意见者的迫害。德语世界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夜晚。将一名来自中国的左翼作家长篇小说译介到此时的德语区,无疑可以看作一种来自德国知识阶层对政治现实的抗议。这种抗议虽然微弱,却如同黑夜前最后的微薄的光芒,代表的是微乎其微的、需要勇气来维系的希望。库恩译本的标题《暮光中的上海》参照了茅盾最初为这本小说选的名字“夕阳”,以及英文版的标题(*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而没有直接翻成“子夜”。标题中“上海”一词很可能是出于大众市场的考量,而前面这个有“微光”“暮光”“曙光”或“双重光”之意的德语词 *Zwielicht*,在体现出他对茅盾作品的理解之余,也暗藏了个人在黑暗历史时期留存的一线微弱的希望。

就这样,东西方在世界战争前的微光中经历了一场文学相遇,共同走向最黑暗的时刻。《子夜》译本本身在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中的接受情况倒并没有太过不堪——至少在胡天石的回忆里,库恩后来写信告知这本书在德国发行情况很好,甚至“大有洛阳纸贵之风”(胡天石 6)。这个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这本书的发行量确实可观:当年的发行量为4000册,1939年又加印了2000册(Kuhn 70)。胡天石将此归因于库恩“亲蒋”的错译,并引用西德左翼奥伯鲍姆出版社几位编辑的发现,说库恩是因为最后将《子夜》结局改成蒋介石控制中国的局势,才得以通过纳粹政府的审查发行。这个解释有些过于简单。二战期间,虽然德国汉学研究基本没有倒退,甚至因纳粹政府的资助而扩大了规模,但对以反封建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现代文学不无警戒;承受巨大禁查压力的出版社也没有再接受库恩继续翻译更多现代文学作品的提议。从译介记录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同德语地区的交流在这个时期基本是一片空白。继《子夜》后,梅茨勒目录记载的第二本中国现代文学德译本是1947年从英文版转译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Rikschakuli*),由一家瑞士出版社发行。在二战期间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恶劣的审查制度下,德语世界的文化传播中心渐渐向不受纳粹统治而相对自由开放的瑞士德语区转移。不仅是大多数文学创作译本,连第一本德语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于同一年在瑞士发行。这本文学史的作者是二战前夕就作为《大公报》驻欧记者侨居英国的萧乾,由后来第一本鲁

迅著作的德译者、奥地利传奇文学经纪人卡尔莫 (Josef Kalmer, 1898-1959) 翻译出版。卡尔莫同萧乾的个人交往大致始于二战期间。1938年, 卡尔莫因犹太背景遭到纳粹政府的追捕迫害, 在维也纳驻奥使馆中国官员的帮助下于1939年流亡到英国, 开始了跨语种文学的出版生涯。流亡期间, 卡尔莫已注意到萧乾在伦敦的中国现代文学系列讲座, 而战后他翻译成德语的现代文学史就是由择选的几篇萧乾讲稿组成。就卡尔莫在德语区中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经历, 瑞士汉学家冯铁 (Raoul David Findeisen, 1958-2017) 曾在一片史料文中详述。冯铁参考了不少卡尔莫私人档案馆里的生平材料, 不仅有考据地叙述了卡尔莫在德语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历, 还对其翻译鲁迅、茅盾和赵树理的原文进行了仔细分析。在文章的最后, 冯铁总结道, “卡尔莫的译文展现了出众的技艺, 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区的接受史涂上了一层持久的底色, 尤其是德语界对作家鲁迅的认识和接受” (Findeisen 410)。

冯铁对卡尔莫贡献的评价是基本准确的。卡尔莫的鲁迅译本在1955年由西德共产党支持的项目出版社 (Projektverlag) 发行——后来1970年代布赫在他的鲁迅译本选集中特意提到了这本具有先驱性的译作。事实上, 在此之前, 卡尔莫的另一本德译鲁迅选集也与萧乾的文学史同时在瑞士发行, 在冯铁文中也有所提及。冯铁没有继续考证挖掘的是这本1947年鲁迅选集在德语社会进一步的影响力。1951年3月15日, 德国《时代》 (Die Zeit) 周报上出现了卡尔莫翻译的一篇鲁迅短文《风筝》 (Drachen), 很可能是鲁迅作品第一次出现在面向德语大众的纸媒上。我们知道, 早在1930年代, 鲁迅作品的译文就开始陆续出现在德国期刊上。可是, 这些期刊面向的是学术界, 而且通常集中在东方学研究领域的汉学圈。相反, 《时代》周报是当今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报刊, 读者群定位在以知识阶层为主的社会大众。二战结束后才在汉堡创刊的《时代》周报, 在1950年代初期还没有今天那么庞大的读者群, 发行量却也在45,000多册左右,^①其影响力是几所大学东亚系订阅流传的汉学期刊无法比拟的。当然, 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鲁迅作品只是卡尔莫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数篇文学译作之一。作为文学经纪人, 他从战前就开始同各种公众报刊联系, 推介外国文学译作以及关于异域生活的创作, 在流亡岁月于异乡重铸文学桥梁。在卡尔莫这样独立中介人的推动下, 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界的传播范围从狭小的汉学学术圈渐渐扩至知识大众, 迎来了战后的曙光。

① 当年具体发行量为45,436册 (比较: 2017年发行量达到505,000册), 该数据来源于德国发行统计局 (IVW), 援引自网站: <http://meedia.de/2016/02/16/70-jahre-die-zeit-im-auflagenvergleich-durchbruch-in-den-60ern-auf-dem-gipfel-anfang-der-90er-und-jetzt/>。

然而,曙光中的相遇又是短暂的,因为这道光很快又分了岔。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德国被划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成为苏美冷战意识形态的战场。德语区内部的文化交流被划分东西德政治边界的墙宇阻隔,中德现代文学的交汇也从此分流。冷战前20年,中国现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主要依照的是两个政治区域泾渭分明的文化政策。墙阻隔了文学书籍的流通,却无法阻断卡尔莫的文学代理工作。从1950年开始,卡尔莫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东西德两边境内新的中国文学出版物上,虽然他主要的居所是在民主德国,并且翻译经营的也多是符合东德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作品,比如茅盾的后期创作和“普罗文学家”赵树理的代表作。在德语区传播中国新文学的过程中,这位奥地利的文学代理人超越了政治霸权强制划分的东西德界限,用陌生的文学提醒他的同辈,至少在语言文化接受层面上,德语世界是一个不可轻易分割的整体。

三、政治浸染中的跨国文学传播

我们看到,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处于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秩序之中,并始终同这种秩序,以及秩序下东西双方各自内部的社会政治情况形影相随。把舵文学交流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媒介个人,组合在一起可以看作一个跨文化的现代知识集体。东西德分裂之后,这个知识集体也分道扬镳,或衔尾政治风向,抑或反抗逆行,却都在某种程度上为传入端的文学撒播烙上一层层更深的意识形态印记。上一节叙述中的卡尔莫,在迁至民主德国后翻译的几部中国文学作品,就是符合苏联占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作(如《李有才板话》),而他译介代理这些作品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在实施民主德国成立以来至关重要的一项文化政策: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引进东德(Müller 199)。与此同时,这场传播源头的中国文学环境也在进一步政治化。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的目的正式被设定为现实政治,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时用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质的界定:“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也就是向为人民群众和政治革命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过渡。中国文学界和整个知识阶层卷入了一场无产阶级大改造,文学格局和其中的作家群发生了“整体性更迭”(洪子诚 29),文学经典化也只剩下唯一的政治准绳。从创作到发行,五六十年代中国整个文学机制受到政治的浸染,主流文学作品大多是该机制下装载意识形态的文字产品,其对外输出的过程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被同种意识形态渗透的海外地区,比如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从中国“进口”这些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的

文学产品是一种冷战格局下政治同盟的文化姿态。举 1951 年被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的 2 部关于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为例: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写于建国时期, 在获奖并正式跻身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文学阵营之后, 这 2 部作品立即在阵营地区流传, 分别于 1952 年和 1953 年由俄语转译为德语在东德发行(Müller 205)。值得一提的是, 同时期在东德出版关于土改的还有另一本作品: 萧乾用英文发表在《人民中国》上的报告文学集《土地回老家》(*How the Tillers Win back Their Land*), 由移居东柏林的奥地利记者、犹太左翼知识分子布鲁诺·海里希(Bruno Heilig, 1888-1968) 从英文翻译成德语, 于 1952 年出版发行。萧乾的这本作品能在东德得到近乎同时性的介绍, 除了因为主题背景符合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 可能也与萧乾此前的欧洲背景, 以及由卡尔莫译介在德语世界建立的名声有关。当然,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 语言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据汉学家梅蕙华的调研记录, 民主德国境内在 1950 年代初发行的很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依然是从英文或俄文转译成德语。这样看来, 萧乾这部作品用英文书写, 确实能更容易也更快得到关注和译介。这个情况到 1950 年代末就发生了转变。民主德国自成立起就开始往中国派留学生, 在十年间成长起来一批有较好现代汉语基础和现代文学研究热忱的汉学家, 能够担起直接翻译与评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任务。因此, 尽管中苏关系自 1956 年进入破裂阶段, 民主德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热度并没有立即降温。梅蕙华在文中特别指出, 这时期的成果是一本 1959 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出版的文选《三月雪花》(*Märzschneeb Blüten*), 收集了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柔石等作家的短文。

另一边, 在代表世界政治格局另一极的西德境内, 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与政治时局的关联并不亚于民主德国。在冷战最初十年, 联邦德国鲜有中国现代文学译著出版, 报刊上发表译文也不算常见。之前说的卡尔莫译著和在《时代》周刊上的译文属于少数, 而且出版刊登的作品也是出自 1949 年以前的重要作家。尽管西德境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没有苏区那样昭然若揭的政治规范, 战后西德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与中国文学自发的关注并非全无政治诉求。事实上, 1960 年代初开始, 西德文化界就对所谓的“纯文学”(*Belletristik*) 产生了质疑, 越来越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这种对文学社会政治功能的要求到 1968 年学生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 以战后精英文学团体四七社的解散为标志。四七社是联邦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文学社团, 由一批享有社会盛名又有一定社会政治诉求的现代德国作家组成, 包括至今仍活跃于德国文艺知识界的著名当代诗人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1929-)。第一节中说到的 1970 年

代编译鲁迅文集的知识青年布赫,从19岁起就作为青年作者同属于四七社,曾受恩岑斯贝格尔等文学前辈的影响,与之有一些文学交集。1968年,由恩岑斯贝格尔主编、苏尔坎普出版社发行的文学杂志《时刻表》(*Kursbuch*)第15期出现了4篇鲁迅德译文,全是鲁迅在1930年代以前写的关于政治革命与文学关系的杂文《文学与革命》《革命时代的文学》《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和《文学与政治的歧途》。除此之外,这期杂志上还有一篇姚阿西姆·施克尔(Joachim Schickel, 1924-)以《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文学》(*China. Kultur Revolution Literatur*)为题的中国文革前后文学情况介绍。显然,最迟到了学生运动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2年后,中国现代文学在联邦德国知识阶层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尽管这里被关注的“文学”其实是由文学承载的社会政治运动。随着左翼学生运动的退潮,以及其极端化尾声的上演,西德知识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政治运动)的关注和接受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5月,西德左翼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RAF)对德国两个美军驻点进行了第一次有冲击力的恐怖袭击,引起了知识界对矫枉过正的“后资本主义批判”的反思。这种反思也能体现在对1968年西德的中国“文学”热的观念矫正上。布赫在编译鲁迅文集的时候,虽然几乎原封不动地收录了翻译发表在《历史的进程》上的4篇鲁迅杂文,但他特别指出了与这4篇译文一起发表的介绍文中“对中国政府官方的裁判过于机械化的接受”。布赫这里指的是施克尔写到文革以前中国文艺界大批判时,直接用了中国官方对胡风和刘宾雁的判决语言,批判他们为“反革命”(konterrevolutionäre)。为此,布赫并没有将这本杂志视为译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可靠来源,而是将一本同样于1968年出版的意大利语版《伪自由书》当作能够对鲁迅进行“有区分性的辩证的判断”的模范(Buch 1973: 212)。显然,布赫译介鲁迅是秉承着同样的判断标准,以纠正西德左翼青年对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区分性”的狂热和缺乏“辩证性”的政治接受。在另一篇文章中,布赫斥责了西德知识界兴起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举出德国共产党/马列(KPD/ML)要求西德作家把中国文革期间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当成创作模范的极端例子。相较于这些西德激进派,“民主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社会现实主义教条者都可以说是自由派了”(Buch 1972: 87)。

然而,布赫此时对西德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并没有脱离文化革命的政治语境。在这篇写于1970年代初的文章结尾,布赫选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维护文艺作品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名言,呼吁进行“文艺问题上两条战线斗争”(Buch 1972: 88)。作为“六八一代”的知识分子,布赫虽然反对摒弃文学的审美独立性,但也坚信文学的政治能量,对新中国以来主

导文艺界的革命文学主张大体是赞同的。文革期间,中国文学与社会动态都是经过政治过滤传输到西德;布赫等德国知识分子在此时期对中国文学的传播、接受和评判就同他们对文革本身的认识一样,不可避免地夹杂着1960年代政治滤镜的碎片。抵制西德政权背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向另一个阵营的偏至,即对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用文革后期来到中国试图通过文学来寻找“真实”中国的一名出版人吴福冈(Wolfgang Schwiedrzik)的话来说,这是出自对“中国”这个“因不同于被修正主义腐蚀的东德与苏联而闪闪发光的形象”(Schwiedrzik 21)的政治向往。1972年末,中国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奥地利也已建交一年,双方知识界才渐渐恢复了少数的个人往来,文学交流的形式和内容也逐渐增多。文革最后几年,每年都有西德和奥地利的汉学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当今德语区传播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汉学家。1976年“四人帮”倒台,理想化的文革图景被彻底摧毁,政治左倾的西德知识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亟需重新拼合他们心目中忽然破裂的完美的红色“中国”的形象(Schwiedrzik 22)。在这个时候,相较于从新闻报道里获取更多贴着意识形态标签的“中国”信息,直接阅读来自中国的时代文学是更好的重新认识“真实”中国的方式:

如果不读巴尔扎克或左拉的作品,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19世纪后半期帝王时代的法国。那么,在我看来,如果不阅读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我们也同样无法准确地理解本世纪前半页,尤其是1911年到1949年的中国。不了解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我们也遑论真正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同上:24)

带着对文学传递历史现实的期待,吴福冈于1978年来到中国,从北京的书店购买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书籍。在一名西德留华学生(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汉学家魏格林,现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的帮助下,他陆续采访了茅盾、巴金、丁玲、艾青、杨沫几位刚刚得到平反的中国作家,出版了一本中国作家访谈实录《文学的春天?》。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吴福冈对西欧1960年代起塑造的红色中国的理想形象深信不疑;而他在这个形象破裂之际,试图用这本实录传递回德语世界的,是藏在文学现实里的一角“真实”的中国,一些“对中国陌生的特质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印象”(25)。如汉学家吕福克(Volker Klöpsch, 1948-)在1980年《时代》周报上的评论,这本书“激烈地驳斥了我们被欧洲主流政治传播所约束的、对文学的肤浅的理解,也攻击了那些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传递中国形象的机

构”(Klöpsch)。西德知识界开始重新审度此前政治趋同的文学目光,以纠正对中国与文学“中国”形象的误读。这种纠正本身依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呈现出来的则是对中国巨幅增升的文学需求。1980年代,西德汉学界翻译研究现当代文学进入最活跃的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界的传播急剧上升。据国内学者最新统计,这十年间的现代文学德语译著数量过百,远远超过此前所有现代文学德译本数量的总和(孙国亮、李斌 104)。一些当代最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如马汉茂和顾彬,在这个时期也对最新的中国文学创作,特别是反思文革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同步的编译与研究。1979年以后,在开放的文化政策下,本土文学的海外传播受到了重视。中德文人的互访交流逐渐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作家前往德国(主要是西德),参加各个大学汉学系和其他文化组织举办的文学活动,如报告、朗诵会和文学节等等。尽管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从内容和形式开始转向,新的审美标准和写作源泉冲淡了政治浸染的印痕,但由于德语读者的文学期待依然同西德知识界从文学中探寻真实“中国”的愿望大体重合,中德现代文学交流没有褪去太多的政治染色。待到1989年两德统一,德国知识界对中国政治风波的激烈批判波及文学交流。一方面,现当代文学德译本数量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逐年下滑;另一方面,相较于中国官方作家作品,流亡知识分子的抗议文学更受德国主流知识界的推崇。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政治化的审美择选彰明显著,一直持续至今。

而这种文学交流的政治性,与其说是官方政治的折射,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时序变换中通过异域文学接受来传递的政治表达。纵观上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历史,无论是起初围绕汉学圈的学术交流、战争年岁的文学守望,还是意识形态路径分叉的理想化政治接受,每一场文学相遇都以德语世界知识分子同其身处远东的同行们交流的愿望为背景,处处可见他们对具有文化与政治双重异域性的现代中国的好奇与向往。这份对未知异域的向往,或许是西方传统在现代式微下的文化“出逃”(Flucht)^①,或许也是当今西方对现代中国文化“误读”的开端,却始终推动着两个世界之间的文学传播。上述几个文学交流的篇章大体可以反映德语知识界的守望是如何推助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传播媒介的变革带来了实时便捷的跨国信息传播,以传递信息为目

① Lange以几位20世纪的德国诗人、哲学家、思想家与他们的中国接受为例,提出现代西方世界将中国作为一个从传统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出逃地”(Fluchtort)。参见 Thomas Lange, “China: Fluchtort vor dem Europäischen Individualismus. Über ein philosophisches und literarisches Motiv der zwanziger Jahre”, in *Fernöstliche Brückenschläge: Zu deutsch-chinesi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im 20. Jahrhundert*, hrsg. v. Adrian Hsia u. Sigfrid Hoefert, 1992: 49-76。

的的异域文学交流须求逐渐减少。然而,加速的信息传播路径可能意味着另一种跨文化现实的失真,亦需要文学真实的填补。不难想象,中国当代文学在德语社会依然会在双方知识界,尤其是在德语区知识分子的推助下,找到新的场域,展开下一页的交流篇章。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uch, Hans Christoph. “Nachwort”, Lu Xun, *Der Einsturz der Lei-feng-Pagode: 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 hrsg. und übers. von Hans Christoph Buch und Wong May. Hamburg: Rowohlt, 1973. 196–213.
- . “Postscriptum: Über Dokumentarliteratur und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Kritische Wälder: Essays Kritiken Glossen*. Hamburg: Rowohlt, 1972. 85–88.
- Findeisen, Raoul David. “‘I am a Sinologist and Expert...’ The Translator Joseph Kalmer as a Propagator of New Literature”, *Studia Orientalia Slovaca* 10 (2011): 389–412.
-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Hong, Zicheng.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zhong guo dang dai wen xue sh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胡天石“《子夜》德译本忆谈”,《世界图书》9(1981):5–7。
- [Hu Tianshi. “Recalling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Zi Ye*” (zi ye de yi ben yi tan). *World Book* 9 (1981): 5–7.]
- Klöpsch, Volker. “Wolfgang Schwiedrzik, ‘Gespräche mit Schriftstellern’, Literaturfrühling in China?” *Die Zeit*, 37 (1980). <https://www.zeit.de/1980/37/literaturfruehling-in-china/komplettansicht>.
- 库恩“德文版《子夜》前记”,《茅盾文学在国外》,郭志刚译,李岫编。长沙:湖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4–125。
- [Kuhn, Franz. “Preface to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Zi Ye*” (de wen ban zi ye qian ji). *Mao Dun’s Literature Abroad*. Trans. Guo, Zhigang. Ed. Li Xiu. Changsha: Hunan People Literature Press, 1984. 124–125.]
- Kuhn, Hatto. *Dr. Franz Kuhn (1884–1961) Lebensbeschreibung und Bibliographie seiner Wer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0.
- Mühlhahn, Klaus.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im 19. Jahrhundert: Mission und Wirtschaft in Interkultureller Perspektive*. Münster: LIT Verlag, 2001.
- Müller, Eva. “Chinesische Literatur in der DDR.” *Fernöstliche Brückenschläge zu deutsch-chinesi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im 20. Jahrhundert*, hrsg. v. Hsia, Adrian, Sigfrid Hoefert, Bern u.a.: Lang, 1991. 199–212.
- Schwiedrzik, Wolfgang Matthias. *Literaturfrühling in China? Gespräche mit Chinesische Schriftstellern*. Köln: Prometh Verlag, 1980.
- 孙国亮 李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研究概述”,《文艺争鸣》10(2017):102–109。
- [Sun, Guoliang, Li Bing.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rmany” (zhong guo xian dang dai wen xue zai de guo de yi jie yan jiu gai shu). *Literature and Art Contention* 10 (2017): 102–109.]
- 王维江“20世纪德国的汉学研究”,《史林》5(2004):7–13。
- [Wang, Weijiang. “Sinology Studies in 20th Century Germany” (er shi shi ji de guo de han xue yan jiu). *History Forest* 5 (2004): 7–13.]